

中国文化史丛书

洞天学府

— 中国书院史话

赵雪

3
7
沈阳出版社

洞天学府

——中国书院史话

赵雪编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前言	(1)
一、何谓书院	
——书院与书院制度	(2)
二、风雨历程	
——书院的历史	(10)
三、众说纷纭	
——四大书院的由来	(18)
四、千载风流	
——白鹿洞书院	(21)
五、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	(50)
六、文化的载体 (一)	
——书院与儒家文化的推广	(75)
七、文化的载体 (二)	
——书院与佛道之关系	(87)

前 言

“书院”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大概是很模糊的。然而，它在从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确实曾经生机勃勃地存在着。直到今天，如果你仔细听，仍然能够听到它那回荡在群山丛林之间的朗朗读书声……

一、何谓书院

——书院与书院制度

“书院”这一名词，最早见于唐代。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明确地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由此说来，最早所谓的书院是整理与贮存图书的地方，类似于今天的图书馆，与后来所说的书院性质大不相同。

就现有唐代史料来考查，袁枚的说法是正确的。《唐六典》中记载：“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之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这里说的“集贤殿书院”就是朝廷设立用以征集、整理、刊集、贮存图书的机构，也就是皇家的图书馆。有了皇家图书馆，以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逐渐又出现了民间、私人的书院、书楼、书堂之类。在《全唐

诗》标题中所出现的书院即达十余多所之多，如：“第四郎新修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山寺读书院”、“南溪书院”等。可见这类书院在唐代已相当普遍。

那么，最早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究竟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天已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有人说始于唐代，有人说始于五代，还有人认为真正是有聚徒性质的书院应始于北宋。更多的研究者则倾向认为书院之名虽始于唐，而真正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则始于宋。

这种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于唐末到五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对文人来说，个人的生命安全尚难以保障，更不要说潜心学术，著书立说了。于是，许多饱学之士纷纷避开这残酷纷扰的现实，来到山林偏僻之处，寻找到一个清静优雅的所在，潜心钻研与著述。

与此同时，因为战乱不断，国无宁日，各朝统治者都无心于文教学术的建设，致使官学废弛，众多年轻向学之士苦于找不到可以专心治学的处所与传业的师长。为了寻求知识与治世之道，这些人也纷纷来到山林之中。这样，在佛家禅林制度的启发与影响之下，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书堂便渐渐演化为私人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的场所，有了“学校”的性质。

书院的产生与书院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时代现实的影响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是书院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书院制度的形成还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

应该说，书院制度就是在佛家禅林制的启发与影响之下形成的。

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中明确地说：“盖儒生学者，遭唐末五代百十余年之摧毁，未能痛快以讲学，斯时即有一种向学之要求！而其规制，则不免受当时佛教禅林制度之影响。”由此可知，当时的“儒生学者”们为了满足自己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的愿望，借鉴了禅林制度的成功模式，形成了在中国延续一千多年之久的书院制度。

严耕望先生说得更详细，他说：“名山古刹既富藏书，又得随僧斋餐，此予贫士读书以极大方便。当时政府不重教育，惟以科举招揽人才，故士子只得因寺院之便，聚读山林，蔚为时风。致名山巨刹，隐然为教育中心之所在。五代两宋书院制度，盖亦萌于此欤？”又说：“唐代佛教承南北朝之盛况，继续发展，臻于鼎盛，此亦助长读书山林之风尚。……寒士出身既惟有勤习诗赋以取进士科第，而贫无特营山居之资，势必借寓寺院静境以为习业之所。……由此言之，宋代书院制度，不但其性质由唐代士子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演进而来，即《书院》之名称，亦由此种风尚所形成，宋人承之而大规其制，以为群居讲学之所耳。”

总之，书院与禅林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书院多“依山林，即闲旷”建在风景秀丽，人烟稀少的地方，类似佛寺禅舍建于山清水秀，清静优雅之地。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书院制度与禅林制度有着许多类似之处。

佛教信徒们每依山林名胜之处，规划丛林。每一座丛林，设“长老”或“住持”一人总其成，类似于书院的一院之长，或称山长、洞主、山主、掌教、主讲等。书院的山长往往聘

请学有专攻，德高望重的名师担任。“长老”或“住持”之下，又分东西两序，东序司总务，西序司教务，下面还有职员赞助。书院之中也设有堂长、斋长、管干、典谒、经长、引赞等职事，管理风纪、经济、迎宾、祭祀、图书、作息等教务与日常生活中的事务。禅林之中，讲学分为五种，分期举行。一是讲经，多在夏节举行；二是小参与晚参，“小参”即指平时随时开讲，在夜间举行者为“晚参”。“参”就是聚众开示，有益于参禅；三日“普说”，为普通讨论集会；四是“朔望及普茶”，类似茶话会性质；五称作“入室请益”，是学者个人向长老问道。（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书院当中的各种教学与研讨的活动形式与这五种讲学方式也十分相似。

起源于私家藏书，读书的书院与官学和纯粹的私学都不相同，它的地位处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办学和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创立了一种成功的教学模式，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传播交流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院址环境的优美，讲学活动的民主自由，教训之合一，学术上的贡献及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使其不愧有“古代大学”的美称。

综合起来看，中国古代书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活动之自由

隋唐之前，中国学者讲学，多在家中设帐，或在侯王府第设帐。宋代以后，讲学则多在书院。书院还既为学者讲学

说书，士子求学读书的教育机构，又是学术研究和学者以文会友的重要场所。

书院常常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甚至是某些学派的发源地。古代的许多在文学或哲学方面具有杰出造就的文学家、理学家以及文学流派，如桐城派、阳湖派等就是通过书院来培养自己的继承者，传播思想与主张。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著名书院还提倡“兼容并蓄”自由讨论的学术活动思想，容许欢迎持有不同甚至相反见解主张的学者来互相切磋，争鸣与研讨，大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特意邀请他的论敌陆九渊升台讲学，并对他的学识极为钦佩，亲自为其在讲义后面书写跋语，后来袁甫与史文卿重建白鹿书院时继承了先辈的传统，聘任朱熹的弟子张洽与遵奉陆学的汤中相继为书院山长。到了明代万历年间，观点不同的南昌章潢与星子熊滨也同在白鹿洞讲学。清代初年，任湖西道的施润章在吉安府庐陵县白鹭洲、景贤两书院，请毛奇龄与杨洪才讲论他们各自所持的不同观点。由此看来，自由讲学是我国古代书院之一大特色，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可贵的传统。

（二）优美的教学环境

古代的书院多建在风景胜地。如著名的岳麓书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脚下，白鹿洞书院建在著名的风景胜地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石鼓书院建于湖南衡阳县北二里石鼓山，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下，应天府书院在河南商丘县城西北隅。

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说：“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冶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详查同异，辨明是非，分析研讨是学术研究所侧重的。而在治学的同时，却不能不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的身心的影响，不用说，山林之中清新爽洁的空气，美妙悦人的风景，鸟语花香，青山白云不仅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更有益于心灵性情的陶冶与熏陶。

前面说过，书院的兴起受禅林精舍的影响很大，佛家注重禅室，讲究清静潜修。其用以参禅悟道的处所也多选择环境优美，人烟稀少的地方，有利于修身养性，书院建置对于院址的选择与此义趣颇为相同。

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中也说：“宋明理学家的讲学，其精舍书院，每择名胜之区，云封深处，结茆构橡，读书环境，清静得很。象明代西樵罗浮等处书院精舍，都是这样的。……清代书院的讲究形势，较明代为重。除府城各大书院限于城里，或建于学宫之旁，或将旧衙署改建之外，在乡邑如新建书院，必选择形胜之地，当时选择形胜，实有两种作用：（1）应取风水，（2）谋合清静。……当时书院很注重环境，求风水是心理上的希冀，而求清静是实际所需要。古人所谓名山事业，就是指后者而言的。”由此更可看出书院建置对于院址环境的注重。

（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书院往往聘请学识渊博，具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来主持院务，称为山长。聘请什么样的人担任山长对于书院声望的高

低，生源的多寡，以及教学成败有着很大影响。

书院可以自行选择学生。不同的书院对招收对象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有的书院只招举人，有的招监生，有的收童生，有的则仅要求志趣相投。有的书院以家族子弟为主要对象，有的则有地域限制，也有的不管哪一族、哪一姓、哪一地、来者不拒。有的对来学生徒要进行考核，亦有的著录即可。”

在老师选择学生的同时，学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与实际情况选择书院与师长。如某一书院有名师掌教，则四方学子都会闻风而来。甚至有的学者，已成进士，也来此肄业。这些从根本上体现了书院办学精神的自主与灵活。

书院的教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以自学为主，就是在师长指导下，学生专心读书，自行理会。除此而外，还有象教师的“升堂讲说”，师生之间的“质疑问难”，学友的“互相切磋”等等。

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与书本，还有象带有宗教性质的祭祀、展礼，以及游历自然山水，考察历史名物等活动。这些灵活多样，注重实践的教学形式无疑是特别有助于人才的培养。

(四) 传播与发扬学术思想

书院兴起与繁盛是在宋代，这不能不说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书院帮助了理学思想的传播与探讨，而理学的兴盛也促进了书院建设的繁荣。

《宋元学案》中的不少学术派别就是以书院来命名的。如

“丽泽诸儒”、“沧洲诸儒”、“岳麓诸儒”、“槐堂诸儒”等等。

宋明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大都以书院为阵地来传授讲说自己的思想主张。如朱熹在知南康军时，兴办了白鹿洞书院，并常去那里讲学，“每休沐常一造，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暇则相与优游泉石间，摅幽发粹，竟日及返”借机传布学说。其它象明代中叶的王阳明、湛若水等都是借书院讲学之便，发表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

在书院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学文的书院外，尚有学武的书院。明代嘉靖年间，任九江兵备副使的何棐曾创办了肄武书院，招收武弁子弟学习兵法、韬略、武经等。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或可称作“古代的大学”，在其长达千年之久的存在过程中，以其特有的教育方式与适宜的研究条件为古代的教育事业，思想史的发展，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是中华古代文化园地之中盛开的一朵朵瑰丽的奇葩。

二、风雨历程

——书院的历史

最早的书院是朝廷设立用来征求、整理、编纂与贮存图书的官方文化机构，即皇家图书馆。后来私人也将自己用来藏书与读书的地方称作“书院”。经过唐末与五代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与衍变，到宋代，书院才正式成为一种与官学性质不同的以聚徒教学为主的学校。

书院制度自宋代确立兴盛之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延续千年之久，可见其影响之大。

书院为什么兴盛于宋代初年？对这个问题，古人已有解释。朱熹《重修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痒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吕祖谦《鹿洞书院记》内述：“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也。”看起来书院的兴盛其主要原因在于经历了五代战乱时期之后，社会和平、文教兴起，

而儒生士子苦于找不到就学之所，在这种社会情况之下，书院应运而生。

费海玘先生在《宋代书院新考》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宋代书院兴起的具体原因，主要有六点，介绍如下：

1. 宋代重文轻武，所以要设置相当数量的书院以供子弟就读习文。

2. 官办的国学、府学、县学的学生中，有许多并非诚心为求学而来，而是为追求功名利禄，这令许多饱学之士感到难以依照个人意愿讲求学术，于是不得不另僻一所，用以自由讲学，专心学术。

3. 有些书院是退休的官僚为培植个人势力而兴办的。例如吾赣的虎溪书院，就是老官僚程天器所创办，最初命名为飞麟学塾，到宋嘉宝年间，他的两个孙子程必东、程必简先后荣登进士，始改名为虎溪书院。

4. 有些书院之创办是为收容流亡的知识分子，如孟珙之创办南阳书院及公安书院，以收容流亡学生，又创办竹林书院以收容襄汉流离之士。其它如龚基先创办淮海书院以收容淮士，陈埧建天门书院以收养淮士之颠沛流离者，如此等等。

5. 有些书院是人口众多的大家族创办的，如奉新胡氏，在胡仲尧手中，创办华林学舍，藏书万卷，远近闻名。

6. 有些书院是为纪念先儒名贤而创办的。如曹圃创立和靖书院以纪念北宋著名隐士林逋，吴渊创立明道书院以纪念著名理学家程等等。

据统计，南北宋书院有年代资料可考者，共有一百八十五所，其中北宋有三十八所，南宋有一百四十七所，江西一地就占一百三十八所。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南宋时期是书院发展的全盛时期。时势的不安、官学的腐败、理学的发达，都大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首开南宋书院兴盛之风气的要算是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

淳熙六年，朱熹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的身份来到庐山附近，发现了白鹿洞故址，为更好地“宣明教化，敦励风俗”他毅然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次年3月工程告竣，即于是月祭祀先圣先贤，招举人入书院，释业开讲，列圣贤为学次第，以示学者，并置建昌东源庄田作为院田以作养士之资。

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壮举，在当时受到了普遍地赞扬与响应，于是二十多年之后，海内书院大盛。

南宋是理学发达时期，名派理学家们纷纷借书院的讲坛来传道布说，如宣扬信奉程朱一派理学的书院就有嵩阳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昭文书院等等。而尊奉与程朱一派在学术思想主张方面相对立的陆象山一派的则有象山书院、竹洲书院等等。

除此而外，书院尚有官立、私立两种。官立者如白鹿洞书院，私立者如泰山、浮沚等书院。

书院制度虽与政府不无关系，有些即为官僚所设置，但在行政与教学方面却不受政府支配，讲习比较自由，主持者也多半是品学兼优，德高望重的名师尊者，其培养出的学生不乏学问切实，品行高操者。

书院的兴盛对当时的学术思想及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宋代国势虽然衰微，然其风俗的醇厚，对气节的提倡，以及学术的发达，却为后人所瞩目。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书院的教育。

进入元代之后，书院建置较之宋代更为兴盛。

《续文献通考》记载：太宗八年，杨惟中跟随皇子库春出征伐宋，并收集伊洛之书藉著作，送达燕京，同时在京城立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祠，并建太极书院，延请儒士赵复、王梓等讲授其间，这是元代创建书院的开始。

从数量上看，我们可以大致感受到元代书院建设的兴盛。据说自元世祖统一中国到顺帝北遁沙漠，短短八十年中，旧有书院不算，只新立者就有七十七所之多，可谓盛矣。

元代书院兴盛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官方的提倡，《元史·选举志》记载，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朝廷下诏，令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贍学者，并立为书院。另一原因是元代统一中国之后，南宋儒者在元朝多不做官，自立书院来讲学。如安徽歙县之友陶书院就是汪维岳不愿在元朝为官，以东晋著名隐士陶渊明自喻而创立的，其他象休宁汪一龙也是宋亡不仕，而执教于紫阳书院，阐释朱子之学，如此甚多，促进了元初书院的发达。

总体来看，元代对于书院似乎比前朝更为重视。因而书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美中有所不足的是至元以后，书院师资混杂，大大影响了它的教学质量，元代著名诗人虞集就曾说：“今天下教官，猥以资格注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这一师资混杂的流弊一直延续到清末而未消，不能不说是书院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憾事。

宋元两代是书院兴盛时期，到了明朝则呈现衰落之势，一是明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统治加强，控制极严。缺乏一种自由研讨讲论学术思想的宽松的政治氛围。二是明代